



国家起源的理论*

◆ (美) 罗伯特·L·卡内罗 (Robert L. Carneiro) 著

◆ 陈虹 陈洪波 译

◆ 陈淳 校

(复旦大学文博系)

在人类存在初期的两百万年里,人们是以游群或村落形式生活的,就我们所知是完全自治的。可能到公元前5000年,村落开始聚集为较大的政治单位。但是,一旦这种聚集过程开始,它的步伐就会加速,并且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导致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形成(在谈到国家时,我指的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单位,在其疆域内包含许多社群,拥有一个集中的政府,政府有权征税,为劳役或战争招募人力,以及颁布并执行法律)。

尽管可以确定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发展的终极阶段,但是对国家的起源仍所知甚微。的确,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是令人完全满意的。它们都因或这或那的原因令人失望。然而,我坚信有一个理论的确为国家的兴起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曾经提到过这个理论^①,在此我将做更充分的阐述。但是在此之前,似乎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几种传统的理论。

明确的国家起源理论出现的相当晚。古典作家如亚里士多德,因不熟悉其它形式的政治结构而认为国家是“自然的”,因此不需要加以解释。然而,探险时代使欧洲人明白,世界上很多人并不生活在国家中,而是生活在独立的村庄或部落中,这使得国家看起来并不那么“自然”,因此需要加以阐释。

在迄今提出的众多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中,我们只考察其中几种。例如,那些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理论现在已经完全不可信,在这里就无需赘述。我们也摒弃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国家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②,或认为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偶然”。这些观点使国家看起来像是某种神秘或偶发事件,将

其置于科学认识之外。依我之见,国家的起源既不神秘也非偶然。它并非“天才”的创造或机会的产物,而是有规律的、明确的文化进程的结果。而且,它并非一种独特的事件,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国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独立形成。哪里有适宜的条件,国家就会在哪里出现。

自 发 论

严谨的国家起源理论有两大类:自发的和强制的。自发论坚持认为: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某些人群自发地、理性地、自愿地放弃他们的个人权力,并与其它群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可以叫做国家的大型政治单位。这类理论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契约论,通常与卢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知道,人们从未有过这种契约,而社会契约论在今天看来只是一种历史的好奇。

最广为人知的现代自发论是被我称之为“自动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的发明自动产生了粮食剩余,这使得一些人从粮食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陶工、纺织工、金属工匠、泥瓦匠等,因而产生了劳动的广泛分工。从这个职业专门化过程中发展出政治整合,使一些先前独立的社群联合成为国家。已故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经常提及这个观点^③。

这个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农业并不会自动产生粮食剩余。我们知道,世界上的许多农业人群并不生产多余的食物。例如,实际上所有的亚马逊流域的印第安人都是农业人群,但是在土著时代他们并不生产剩余食物。虽然事实表明他们具有生产剩余食物的技术潜力,即在欧洲定居者需求食物的刺激下,

* 译自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1970, 169:733-738.

一些部落为了贸易确实增加了木薯的产量,其数量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需要^④。因此,产生食物剩余的技术手段是存在的;但是缺乏使之实现所需的社会动力机制。

另一个流行的国家起源自发论是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的“水源论”。就我的理解而言,威特福格尔认为国家是以下列方式兴起的:在世界上某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村民们不得不通过小规模灌溉的方式来养活自己。当他们看到这种方式对大家都是有利的,一个时代随之来临——他们放弃自治并把村庄联合为一个大型政治单位,以便从事大规模灌溉。他们设置官僚体制来规划和管理如此宏大的灌溉工程,继而引发了国家的诞生^⑤。

这一理论近来陷入了困境。当前的考古证据清楚地表明,在威特福格尔用来证明其“水源论”的地区中,至少有三个——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墨西哥——在大规模灌溉之前已经产生了羽翼丰满的国家^⑥。因此,在国家的兴起中,灌溉并没有扮演由威特福格尔赋予的关键角色^⑦。

这个理论和其它所有关于国家兴起的自发论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无法解释自治的政治单位为何在没有重大外部压力时会放弃他们的权力。我们发现这种缺陷在从小型村落到大型帝国的各种政治单位中反复表现出来。实际上,我们可以浏览历史的篇章,却难以发现有真正的案例适用于这个规则。因此,为了说明国家的起源,我们必须放弃自发论,寻找别的出路。

强制论

对历史的详细考察表明,只有强制论才能够说明国家的兴起。武力和未开化的私利,是一步步导致自治村落走向国家的政治演化动力。

战争根植于国家绝非新的观点。2500年前赫拉克利特写道,“战争是万物之父。”但是,最早关于战争在国家起源中作用的仔细研究距今不到百年,是由赫伯特·斯宾塞(H. Spencer)在其《社会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⑧。大陆作家的征服论,可能比斯宾塞关于战争和国家的著作更为大家所熟知,例如路德维格·古姆普罗维兹(L. Gumplowicz)^⑨、古斯塔夫·拉兹恩霍弗(G. Ratzenhofer)^⑩及弗朗兹·奥本海默(F. Oppenheimer)^⑪等人。

例如奥本海默提出,国家是农业定居者的生产力结合游牧者的能量、并通过后者对前者的征服出现的。然而,这一理论存在两个严重缺陷。第一,它无

法说明美洲本土国家的兴起,那里尚未发现游牧业的存在。第二,现在已经充分证明,在最早的国家出现之前,旧大陆的游牧业尚未兴起。

尽管特定强制论尚有不足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战争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发现于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日本、希腊、罗马、北欧、中非、波利尼西亚、中美洲、秘鲁和哥伦比亚,这里只提一些最著名的例子。

因此,以北欧的日尔曼王国为原型,爱德华·詹克斯(E. Jenks)认为,“就历史而言,没有任何困难可以证明所有现代类型政体(即国家)的存在都归功于成功的战争”^⑫。詹·范西纳(Jan Vansina)的《热带大草原的王国》^⑬是一本未经理论检验的书,我们发现,中非的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接连兴起的。

但是,这条规则就真的没有例外吗?在世界的某处,就真的没有一个国家不通过战争动力兴起吗?

直到几年前,人类学家们还普遍相信古典玛雅就是一例。当时的考古证据没有一点关于早期玛雅战争的迹象,这使学者们认为它是一个完全不通过战争兴起的、热爱和平的神权国家^⑭。但是,这个看法现在站不住脚了。近来的考古发现赋予古典玛雅以完全不同的见解。第一个是博南帕克(Bonampak)壁画的发现,它表现了早期玛雅的战争以及折磨战俘的狂欢。接着,在蒂卡尔(Tikal)附近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围绕着该古代玛雅城市的土方工事,清楚地指明了与邻近瓦夏吞(Uaxactun)的军事敌对状态^⑮。总结目前对该课题的思考,迈克尔·科(M.D.Coe)说,“古代玛雅像后古典时代的嗜血国家一样热衷战争”^⑯。

然而,虽然战争的确是国家起源的主动力,但它却非唯一因素。毕竟在世界上许多发生战争的地方并没有出现国家。因此,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足条件。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我们可以认为战争是国家形成的动力机制,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促成国家兴起的特殊条件。

环境限制

我们如何确定这些条件呢?一种有希望的方法是,在全世界那些独立产生国家的地区寻找共同因素——诸如旧大陆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谷以及新大陆的墨西哥河谷、秘鲁的山地和沿海河

谷。这些地区在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如海拔、温度、降雨、土壤类型、干旱模式及其他许多特征。但是,它们的确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耕地都受到限制。其中每一个地区都被高山、海洋或沙漠隔开,这些环境特点明显限制了该地区农业人群占据并耕种的土地。可以说,在这个方面,这些地区与亚马逊盆地或北美东部的森林地带是极其不同的,那里绵延不断的森林提供了几乎不受限制的耕地。

但是对于国家起源来说,受限制的耕地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其意义可以通过比较世界上两个不同生态环境地区的政治发展来理解——一个地区拥有受限制的耕地,而另一个地区拥有绵延不断的不受限制的土地。我用来比较的两个地区是秘鲁的沿海河谷和亚马逊盆地。

我们的考察始于已出现农业群体但尚处于完全自治的阶段。首先来看亚马逊盆地,我们看到那里的农业村庄数量很多,却极为分散。即使在那些相对密集的地区,村庄之间的距离至少也有10至15英里,如兴谷河(the Upper Xingu basin)上游盆地。因此,即使简单轮作形式需要大量的土地,典型亚马逊社群周围仍然有足够的森林土地满足其农业需要^①。就亚马逊地区整体来说,人口密度较低,土地造成的生存压力较小。

战争在亚马逊流域肯定经常发生,但它通常是出于复仇、掠夺妇女、获得个人威望及类似的动机。因为不缺土地,因此也没有为了土地而发生的战争。

亚马逊流域发生的此类战争的后果如下:落败的群体并未按惯例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胜利者既没有做出任何切实的努力使被征服者臣服,也没有强索贡品。这也许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很难做到,因为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能够阻止失败者逃到更远的地方。的确,落败的村庄常常选择这样做,倒不是为了避免征服,而且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袭击。由于亚马逊流域中的聚落如此稀疏,所以无需穿越他人的领地就可以很容易的在森林中发现并占据新的地区。而且,因为实际上森林中的任何地区都适合耕种,所以新生境中的维生农业能够像过去一样顺利进行。

显而易见,通过这个争斗和迁徙的过程,农业部落逐渐扩散,直到他们稀疏而广泛地覆盖了几乎整个亚马逊盆地。因此,在亚马逊流域无限的耕地和稀疏的人口之下,战争使那些村落分散到广阔的地区中,并保持自治。除了极个别下面会提及的例外,亚马逊流域没有那种村庄霸占土地并结成较大政治单

位的趋势。

秘鲁沿海狭长河谷所发生的事件与亚马逊流域的情况明显不同。我承认对这些事件的重建只是推论,但是我认为它与考古证据是一致的。

我们对这一阶段的解释始于那些小的、分散的、自治的农业群体。但是,不像亚马逊流域那些分散在雨林中广大地区的村庄,这里的村庄局限于78个狭短的河谷中^②。而且,每个河谷都是背山面海,像世界上任何干旱地区那样,两侧被沙漠包围。可能没有哪里能找到比这里限制更明显的农业河谷了。

像一般的新石器时代群体一样,秘鲁沿海河谷村落的规模会不断扩大。由于自治村庄很可能随着扩大而分裂,只要有土地可供分裂出去的群体生存,那么这些村落无疑就会不断分裂^③。因此,村落数量的增加往往快于其规模的扩大。河谷中的村落数量可能持续增加,无需改变生产实践,直到河谷中所有适于耕作的土地都被耕种。

到此时,农业技术开始出现两个变化:对已耕作土地进行强化利用;通过梯田和灌溉来耕种那些新的、之前不用的土地^④。

新增可耕地的速率仍不能满足需求的增长。甚至在土地短缺变得如此严重之前,灌溉就已经开始系统地实施,村落已经无疑纷纷为土地而战了。在此之前,当农业村落的数量仍然很少而且不乏土地的时候,秘鲁沿海河谷发生的战争可能与上述亚马逊流域类似。随着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不断加剧,战争的动机从复仇转向对土地的需求。而且,随着战争的动机逐渐以经济为主,战争的频率、密度及重要性也随之增加。

一旦达到这个阶段,秘鲁那些战败的村落会面临着与亚马逊流域战败村落非常不同的结果。我们看到在亚马逊,落败者可以逃到新的地方,像从前那样定居,并维持其独立。但是在秘鲁,战败村落的居民并没有这种选择。高山、沙漠和海洋而非相邻的村落阻止了他们向任何方向逃逸。因此,一个在战争中失败的村落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了。如果它被允许留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不是被消灭或驱逐,这个让步就只能付出很高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在政治上对胜利者臣服。这种臣服通常至少要支付某种贡赋,战败的村落要生产比过去更多的食物来提供这种贡赋。但是臣服有时也包括战败的村庄进一步丧失自主权——也就是说,要融入胜利者统治的政治单位中。

通过这类战争的频繁发生,我们看到在秘鲁沿

海出现了许多在规模和组织程度上都超过了村落的领土一体化的单位。政治演化达到了酋邦的水平。

由于土地短缺持续出现,而且变得更加严重,战争也出现类似的趋势。然而,现在的竞争单位已不再是小型村落,而是大型酋邦了。从这点来说,通过酋邦对酋邦的征服,政治单位的规模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扩大。自然而然地,随着自治政治单位规模的扩大,其数量也相应减少,结果整个河谷最终被最强大的酋邦统一。该政治单位因而无疑地有效集中并复杂到足以称之为国家。

我所描述的某个秘鲁河谷的政治演化,同样也在其他河谷、高地及沿海发生过^①。一旦出现以整条河谷为领土的王国,那下一步就是通过弱肉强食来建立多河谷的王国。这个过程的顶点就是秘鲁通过其最强大国家达到的征服^②,以及一个伟大帝国的形成。虽然这一步可能在安第斯山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二次,但最后是由印加帝国完成的^③。

政治演化

尽管村庄合并成酋邦以及酋邦合并成王国是通过对外攫取而发生的,但是这些不断扩大的政治单位的结构也通过内部革命日益细化。当然,这些内部变化与外部事件密切相关。成功国家的扩张产生了疆界,以管理其征服的民众和领土。那些在战争中表现突出的个人,一般被任命为政治官员并委以管理的职责。除了维护法律规章和征收赋税外,管理阶层的功能还包括调动劳力建造灌溉工程、道路、城堡、宫殿以及寺庙。因此,他们的功能有助于将一个分散国家的集合体融入一个统一、集中的政治单位。

同样是这些由战争而提高了社会地位的人,与其统治者及其亲属成为上层阶级的核心。下层阶级是由战俘并被他们的捕获者用作仆人和奴隶而形成的。为此,战争有助于社会阶级的形成。

我发现,人们在充分利用自己土地之前就试图获得其邻居的土地。这意味着每个自治村落都有粮食生产未开发的范围,只有当该村庄被征服并被强迫缴纳赋税时这个范围才会被启用。剩余食物是通过赋税从被征服村庄取得的,它们通过汇集而变得数量可观,其中大部分用来供养那些完全脱离粮食生产的人,如统治者、他的武士、随从、官员、祭司及上层阶级的其他成员。

最终,那些由于战争而失去土地但又未被奴役的人会流入一些聚落中,这些聚落由于其管理、商业或宗教的专门功能而慢慢变为镇和城。在那里,他们

以工人或匠人为生,用他们的劳力或产品去交换统治阶级从村民手中榨取的、用来改善他们生活水平的部分经济剩余产品。

我所勾画的秘鲁沿海河谷的政治演化过程,就其本质特点而言,决非仅限于该地区。在世界上其他农业土地受限制的地区,如墨西哥河谷、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谷及印度河谷,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以同样的方式发生,而且其本质原因是相同的。在这些地区,自治的新石器时代村落由酋邦取代,酋邦由王国取代,王国由帝国取代。当然,这个发展的最后阶段是最令人难忘的。早期帝国的规模和壮观超越了以往的一切。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帝国仅仅是这个过程逻辑顶峰。导致帝国出现的整个链条中的最根本步骤,是从村庄自治向超村落聚合的转变。这一步是质变;其后的每件事情只是量变而已。

除此之外,超社群集合体很难达到,这一步用了两百万年。但是,一旦走到这一步,一旦村庄自治被超越,那伟大帝国的形成以及复杂文明的繁荣只需两、三千年就够了。

资源集中

理论形成是以某些有限的事实为基础的。然而,一种理论最终必须面对所有的事实。新的事实通常比较棘手,或与这个理论不一致,或与之不合。成功理论与不成功理论之间的区别是,它能够被修正或被详细阐述以适应所有的事实。让我们来看看当面对某些似乎是例外的事实时,“限制论”如何仍然可行。

首先让我们回到亚马逊流域。早期沿亚马逊河而下的旅行家留下了沿河文化的文字证据,这个文化高于我描述的亚马逊文化。16世纪时,居住在亚马逊河两岸的土著居民比较密集,村庄大且紧密相连,并已经存在某种程度的社会分层。而且,一些最高酋长统治着那里许多的社群。

问题立刻产生了:由于可耕地沿亚马逊河向外几百英里延伸,这里为什么会出现酋邦?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仔细观察亚马逊河提供的环境条件。在河岸边缘以及其中的岛屿上,有一种土地叫做 varzea。河流每年淹没这些土地并覆盖上一层肥沃的淤泥。由于年年补充, varzea 成为最好的农田,即它每年都可以耕作而无需休耕。对当地农民而言,它具有很高的回报值和占有值。亚马逊河的水中资源也非常充足,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鱼、海牛、海龟、海龟蛋、宽吻鳄及其它水产。由于资源的集

中,作为栖居点,亚马逊河沿岸明显优于内陆。

亚马逊河沿岸资源的集中几乎等同于某种限制。尽管高产和非高产土地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就像秘鲁那样,那里至少有一种鲜明的生态梯度。亚马逊河流域的回报与邻近地区相差如此之大,是如此令人向往的栖居地,所以周围的人们都被吸引过来。最终,河流沿岸的拥挤人群导致了为争夺沿河部分的战争。战争中的落败者,为了继续接近河流,常常别无选择地臣服于胜利者。由这些村落向亚马逊河沿岸酋邦最高酋长的臣服,代表了比盆地其他地区更高级的政治进步^④。

资源集中的观点同样可以解释秘鲁沿海的人群已明显达到了令人惊奇的政治发达程度,尽管他们仍然主要以渔猎为生,而且农业只是辅助手段^⑤。关于这个看似反常的现象,兰宁(Lanning)写道:“据我所知,这是唯一没有基本农业经济基础却具有如此多文明特点的案例”^⑥。

但是,用资源集中的概念来看,我们可以说明这个发展并不反常。对此可以做如下解释。秘鲁沿海野生食物资源的数量和种类相当多,但是它们仅限于极其狭窄的陆地边缘^⑦。因此,当这个地区充足的食物导致人口激增时,这类食物的限制很快就导致可开发地区的完全饱和。而且当可获资源的压力达到临界点时,土地竞争就难以避免。这种竞争的结果便是产生了我所描述过的一系列政治演化事件。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将资源集中作为一个导致为土地而战的因素,添加到环境限制中来,政治一体化也因此超过了村落的层次。

社会限制

但是在说明国家形成时,还有另一个因素值得考虑。

在用环境限制讨论委内瑞拉的雅诺玛摩(Yanomamo)印第安人时,查格农(N. A. Chagnon)^⑧引入了“社会限制”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地区的高密度人口可以通过环境限制对中心地区附近的人口产生影响。对我而言,这个观点对我们的理论是重要的补充。根据查格农的观点,让我们来看看社会限制是如何在雅诺玛摩人中起作用的。

雅诺玛摩的成员约10000人,居住在毫无限制的广阔雨林地区,远离任何大河。也许有人期望雅诺玛摩村庄能因此而或多或少的均匀分散,但是,查格农注意到,在雅诺玛摩的领土的中心,村庄要比周边地区更加密集。由于这点,他们往往会彼此侵犯,结

果战争发生的频率很高,而且在中心地区比周边地区更激烈。对于核心地区的村庄来说,试图通过迁徙来逃避袭击更加困难,因为不像周边那些村庄,他们的迁移能力多少受到了限制。

其结果是,那些雅诺玛摩中心地区的村庄比其他地区的村庄大,因为大村庄有利于袭击和防御。核心地区激烈战争的进一步影响是使该地区村庄的头人更加强大。雅诺玛摩的头人也是战争领袖,他们的影响也随其村庄所参与的战争而增强。此外,雅诺玛摩中心地区村庄之间的进攻和防御联盟比周边地区的更为普遍。因此,尽管政治结构仍处于自治村庄的层次,但是那些受制于社会限制的雅诺玛摩人,已明显向更高级的政治发展方向有所进步了。

尽管雅诺玛摩的社会限制仅仅表现为中等程度,但是这种限制足以造成政治结构层面的差异。社会限制对那些表现更为突出的地区效果更为明显。首先,每个村庄的领地规模日益缩小。其次,由于人口压力日益严重,争夺土地的战争随之发生。但是,由于周围几英里内的土地都已有归属,战败的村庄便无处可逃。就这点而言,战争对该村庄带来的结果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演化,应该和我在讨论环境限制时所描述的相同。

回到亚马逊河流域,如果社会限制在当今的雅诺玛摩中起作用,那么很明显在400年前它肯定也在亚马逊河的部落中起作用。而且其影响无疑会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的政治演化。

于是我们看到,即使没有严峻的环境限制,资源集中和社会限制等因素也会通过强化战争和转向攫取土地,给政治发展以有力的推动。

随着这些补充性理论的加入,与过去相比,限制论现在已经可以很好的应对所有案例了。例如,这个理论现在可以用来说明华北黄河流域和玛雅低地佩滕(Petén)地区的国家形成,这些地区的农田都没有明显受到限制。在黄河流域的案例中,资源集中和社会限制无疑存在并是积极的动力。在玛雅低地,资源集中似乎不是主因,但是社会限制则比较明显。

一些考古学家可能持有反对意见,认为形成期的佩滕地区人口密度太低而不足以形成社会限制。但是,在评估能够产生这种影响的人口密度时,我们必须考虑并非不是所有的土地都用来供养人口的。而且这种维生区域的规模不仅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有赖于生存模式。古代玛雅一直采用的轮作农业^⑨要比墨西哥河谷或秘鲁沿海永久的农田耕作需要更多的人均土地^⑩。结果,就影响而言,佩滕相对较

低的人口密度和墨西哥或秘鲁较高的人口密度所产生的效果基本相同。

我们已经从雅诺玛摩的例子中了解到,即使在人口相对分散的地区,社会限制也会起作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佩滕在形成期时已拥有了比今天雅诺玛摩更密集的人口。因此,玛雅低地的人口密度,尽管呈现分散的表象,但实际上已足以刺激土地争夺,并且为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内部动力。

结 论

简言之,限制论就其完备的方式足以说明国家的起源。它解释了国家为什么在某地兴起,而在其他地方则失败。它表明,国家是对某种特定文化、人口及生态条件的可预见的反应。因此,它有助于阐明什么是人类政治演化中最重要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与注释:

① R. L. Carneiro, in *The Evolution of Horticultural Systems in Native South America: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 Symposium*, J. Wilbert, Ed., *Antropologica (Venezuela)*, Suppl.2 (1961), pp.47-67, see especially pp. 59-64.

② 例如,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沃德 (Lester F. Ward) 视国家为“理性才能非凡实践的产物”,在他看来这点是如此特别,以至于“它一定产自一个大脑或少数一致的想法”。[*Dynamic Sociology* (Appleton, New York, 1883), vol. 2, p.224].

③ 例如,见柴尔德 (V. G. Childe) 的 *Man Makes Himself* (Watts, London, 1936), pp.82-83; *Town Planning Rev.* 21, 3 (1950), p.6.

④ 我在自己的文件中记录了亚马逊流域诸如 Tupinamba, Jevero, Mundurecu, Tucano, Desna, Cubeo 及 Canela 等部落生产剩余食物的例子。对该地区民族学文献的详尽的研究无疑能揭示更多的例子。

⑤ 威特福格尔认为:“当农人或原始农人摸索中的社群发现在一片干旱但具有潜在肥力的区域存在一大块绿洲,许多农人就会渴望加以占有[农业的而非军事的],于是干燥的低地和平原就会被迫求助于组织手段,在原始技术的基础上提供一种成功的机会;他们必须和其他农人合作,并臣服于一个领导权威,于是这类形式[指组织和社会的控制——也即国家]就产生了”[*Oriental Despotism* (Yale Univ. Press, New Haven, Conn., 1957), p.18].

⑥ 罗伯特·亚当斯 (Robert M. Adams) 对美索不达米亚作出这样的总结:“简言之,并无迹象表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王朝权力的形成是与主要运河系统的管理需要相关”[in *City Invincible*, C. H. Kraeling and R. M. Adams, Eds. (Univ.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60), p.281]. 对于威特福格尔水源论原型地区的中国,法国汉学家 Jacques Gernet 最近写道:“尽管建立了水路和灌溉的规则系统,并对该系统进行管理,并很可能影响到军事列国和中华帝国的政治结构,但事实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只是业已存在的国家结构以及由军队提供大量训练有素的劳力,使得修建宏伟的灌溉工程成为可能”[*Ancient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mpire*, R. Rudorff, Transl. (Faber and Faber, London, 1968), p.92]. 就墨西哥而言,在古典期之前没有大规模的灌溉系统。明显的是,早期国家出现在更早的形成期或前古典期。

⑦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规模灌溉在其存在的地方对于增加国家的力量和规模作用不大。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不与威特福格尔争论他将自己论点所限定的范围,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家如何增强其力量,而是为何在原地起源的。就这点而言,水源论看来并没有抓住要点。

⑧ 参见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Selection from Herbert Spencer's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R. L. Carneiro, Ed. (Univ.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67), pp.32-47, 63-96, 153-165.

⑨ L. Gumplowicz, *Der Rassenkampf* (Wagner, Innsbruck, 1883).

⑩ G. Ratzenhofer, *Wesen und Zweck der Politik* (Brockhaus, Leipzig, 1893).

⑪ F. Oppenheimer, *The state*, J. M. Gitterman, Transl. (Vanguard, New York, 1926).

⑫ E. Jenks, *A History of Politics* (Mcmillan, New York, 1900), p.73.

⑬ J. Vansina, *Kingdoms of the Savanna*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1966).

⑭ 例如,朱利安·斯图尔特 (Julian H. Steward) 写道:“因此很有可能的是,玛雅仅仅是因为他们享有非同寻常的长期和平而建立起高度的文明;因为他们的聚落形态似乎太脆弱而无法承受战争”[*Amer. Anthropol.* 51,1(1949), 见 p.17].

⑮ D. E. Puleston and D. W. Callender, *Expedition 9 No.3*, 40 (1967), 参见 pp. 45,47.

①⑥ M. D. Coe, *The Maya* (Praeger, New York, 1966), p.147.

①⑦ 参见 R. L. Carneiro, in *Men and Cultures, Selected Paper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A. F. C. Wallace, Ed.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60), pp.229-234.

①⑧ 在农业时期的初始(前陶时代 期,约始于公元前 2500 年),沿海的人类聚落似乎要比河谷里的密集,生存方式主要依赖渔猎而非农业。而且,一些超越自治村落的初级政治演化可能已经这一阶段发生。但是,一旦生存方式开始为以农业为主,聚落形态随之变化,于是社群更多地集中在河边的村落中,因为只有那里才有适于耕作的土地。见 E. P. Lanning, *Peru Before the Incas*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1967), pp. 57-59.

①⑨ 在我的资料中我在以下的部落里发现了有关亚马逊流域村落分裂的报道:Kuikuru, Amarakaeri, Cubeo, Urubu, Tupari, Yanomamo, Tucano, Tenetehara, Canela, and Northern Cayapo. 根据亚马逊流域发现的易于重新定居的条件来看,分裂通常发生在人口少于 100 人的村落,而且村落大小不会超过 200 人。但是在秘鲁沿海,那里的土地受到严重限制,村落无法随意分裂,因此根据兰宁的观点 [*Peru Before the Incas*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1967), p.64], 其平均人口很可能会达到 300 人以上。

②⑩ 参见 R. L. Carneiro, *Ethnograph.-archaeol. Forschungen* 4, 22 (1958).

②⑪ 很自然,这种演化在秘鲁各村落中以不同的速度发生,并会达到不同的程度。事实上,可能在某些村落达到政治统一时,其他的村落还没有超越村落自治的阶段。

②⑫ 但是,在帝国的建立中,并不是每一步都必须通过真正的武力征服来实现。有时武力威胁具有相同的效果。许多较小的酋邦和国家可能无需通过战争就能被迫放弃他们的主权。事实上,这就是印加帝国一项明确的策略,在动用武力之前就将其说服。参见 Garcilaso de la Vega, *Royal Commentaries of the Incas and General History of Peru*, Part 1, H. V. Livermore, Transl. (Univ.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66), pp.108, 111, 140, 143, 146, 264.

②⑬ 因此在秘鲁,帝国的演化不可能是直线或不可逆转的。兴衰交替发生。有时统一之后就是分裂,于是国家分裂并倒退至酋邦,甚至可能倒退至自治村落。但是政治发展的潜力是强有力的,并能最终取胜。因此,尽管存在波动和倒退,但是秘鲁演化的轨迹是清楚的:它始于许多小型、简单、分散、自治的社群,最后以单一、庞大、复杂并集中的帝国而告终。

②⑭ 事实上,类似的政治发展也在亚马逊的另一地区发生——玻利维亚莫约斯(Mojos)平原的玛莫(Mamore)河盆地。这里集中的资源也起着关键作用。参见德内冯(W. Denevan), "The Aboriginal Cultural Geography of the Llanos de Mojos of Bolivia." *Idero-americana* No.48 (1966), pp.43-50, 104-105, 108-110。在北美本土,墨西哥北部的密西西比河中游达到了最高层次的文化发展,它也是沿着主要河流(密西西比河)分布,由河流中的食物资源构成肥沃的土壤构成了资源集中区。参见 J. B. Griffin, *Science*, 156, 175 (1967), p. 189.

②⑮ E. P. Lanning, *Peru Before the Incas*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1967), p. 59.

②⑯ 于是在这里,资源的集中与环境的限制结合在一起。而且,实际上诸如尼罗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这些被大沙漠包围的河谷情况完全相同。

②⑰ N. A. Chagnon, *Proceedings, 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Tokyo and Kyoto, 1968), vol. 3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p. 249 (especially p. 251). 也可参见 N. Fock, *Folk* 6, 47 (1964), p. 52.

②⑱ S. G. Morley and G. W. Brainerd, *The Ancient Maya* (Stanford Univ. Press, Stanford, Calif., ed. 3, 1956), pp. 128-129.

②⑲ 我认为,人们可以这样设想,玛雅人口密度任何实质性的增长,都伴随着某种强化的农业。当人口增长,土地可能会被更彻底地除草,也可能在全年和两年更长时间里仔细加以耕种,同时轮种时间减少。然而,就潮湿的热带土壤的性质和缺乏任何施肥的证据而言,玛雅人看来很可能采取了广泛而非强化的耕作方法。



本期导读

一.《国家起源的理论》

千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

(陈淳)

二.《工艺生产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社会复杂化的表层是社会分层和政治组织形式上的专制统治,但社会复杂化无疑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文德安(Anne P. Underhill)教授的《中国北方地区手工业生产与社会变迁》(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一书,就是从陶器生产探讨社会复杂化过程的一部专著,本文是该书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作者的研究意图和书中将要采用的阐释理论。

作者长期从事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至夏商考古学研究。她注意到,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陶质或铜质饮食器具在贵族奢侈品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作者认为,饮食器具地位的凸现,显示的是社会上层对高级食物和饮品以及生产、制作这些食品所耗费的劳动力的占有,是社会上层集团为了在竞争中彰显自身财富和威望这一社会行为的反映。为了适应这种社会需求,陶器手工业者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力,增加产品种